

17岁上海女孩为66岁外婆写了一本口述史

『我终于认识了外婆，看到了一个时代』

晨报记者 孙立梅

因为从小由外婆吴根妹带大，17岁的上海女孩商楚尚跟外婆的关系特别亲。饶是如此，每次看到外婆哪怕剩下半碗稀饭、也要用保鲜膜罩起来放进冰箱的做法，她依然很难理解，“这一点都不环保”。

直到她开始采访外婆、并且通过文字再现外婆关于贫穷、饥饿、打拼的回忆时，才终于开始理解，为什么很多老年人都节俭得让人匪夷所思：“菜实在吃不完可以倒掉，但是米饭绝对不行”，“因为饿的记忆太深刻了，粮食太宝贵了，千万不能浪费一粒米”。

跟正在读高中的外孙女截然不同，吴根妹的17岁是这样过来的：组建“铁姑娘战斗队”，在稻田里除草、捉虫，习惯了蚊虫叮咬和蛇虫横行，割稻时割下了半个脚趾又被老农民用泥巴糊了回去……

这些回忆，最终构成了由吴根妹口述、商楚尚撰写的《外婆和她的房子》一书。

在读者普遍的印象当中，“口述史”的传主，往往都是知名人士，或者有其特殊身份。现年69岁、在江苏吴江农村出生长大成家生女、后来又随女儿来到上海生活的吴根妹，显然并不在此列。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到外婆和外孙女当中的链接——这家的女儿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。

在沈奕斐看来，吴根妹的重要身份，恰恰在于她的“没有身份”，“平凡、没有特殊身份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身份，这一身份虽然在研究中常常不是主流，但是在生活中恰恰是主流”。

听外婆讲过去的事情

沈奕斐和商楚尚两代女儿，都是听着吴根妹的故事长大的。虽然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，但吴根妹好学、又爱看书，讲起家族往事来绘声绘色。这是《外婆和她的房子》得以问世最重要的原因：“外婆是一个非常好的讲故事的人，让我也很有兴趣倾听，这可能是很多老年人做不到的。”

同样吸引商楚尚听下去的，还因为外婆的生性乐观、极少抱怨，始终保持着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积极进取的态度和智慧：读书的时候是优秀的学生，务农的时候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积极分子，当上工人之后是先进工作者，工厂效益不好她就做起了各种副业且都能做得有声有色……

在沈奕斐眼中，“我母亲其实就是那个想法不多，但是做好每件事情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努力适应时代变化的一个普通中国人”。但即便放在今天，“做好每件事情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”本身，就已经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了。

10多年前，沈奕斐就邀请学生做吴根妹访谈，留下了数份各有侧重的笔录。而因为女儿“你的故事完全可以出一本书”的说法，吴根妹还自己动手，写了一部分自己的人生。虽然这些资料被长期搁置下来，但“出一本书”，始终是吴根妹的心愿。

直到2020年，因为疫情关系，商楚尚在家学习，无意中发现了外婆的手稿和之前的访谈笔录。“外婆是一个我非常熟悉日常但是却不了解其历史的亲人。我知道她为我做了什么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永远那么有牺牲精神，为什么她每次都能做得那么好；我知道她现在的生活状态，但是不知道她过去的人生、她的情感。”商楚尚开始动手整理

这些资料，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：不同采访者有不同的逻辑主线，很多采访的时间线并不准确，外婆10年前的讲述和现在的说法也存在出入，大量的细节需要补充采访和实地探访，等等。

“其实是外婆自己非常想讲述这个故事，非常想出这本书，这坚定了我把它写出来的信念。现在我感觉自己做对了，因为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外婆非常开心。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，也没送过她什



商楚尚与吴根妹

么好的礼物，这本书算是一个反馈吧。”

一套房子承载一段人生

在吴根妹的故事当中，讲得最好的，是她不同阶段居住的房子。现在在我们讲究以人为本，人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但对外婆他们那代人来说，只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才能提供最大程度的安全感，所以我就想通过房子，引出外婆的人生故事。”

中国人对家以及房子的执着，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。尤其是对“50后”的吴根妹来说，每一套房子的更迭，不仅与她的人生阶段紧密相连，也是她实实在在、可观可感的奋斗成果的最好证明。

在外婆住过的房子当中，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，当属1985年外公外婆首次买下来的公房。这套房子先后装修过3次，第一次装修时，外婆在电视上看到上海有钱人家用菱形木板拼成的地板，觉得非常好看，但自己家里买不起，于是就用土黄色油漆画出菱形格子。为了保护这种花纹，外婆要求家人上楼要换鞋，这种做法被当年还没有进屋换鞋习惯的邻居称为很“城市人”。

直到1998年第三次装修，这套房子装了天花板，楼下面换了地砖，楼上改成了外婆梦寐以求的木地板——10多年前的“城市人”习惯，此时已经非常普及了。

吴根妹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当年电视上看到的“城市人”之一。2001年，沈奕斐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读研，以“学校正在招聘宿舍管理人员”为由，劝母亲来上海试试。

为了照顾女儿的生活，帮女儿尽快在上海买到房子，吴根妹从此开始“沪漂”生涯。女儿租的复旦旁边的筒子楼，成了她住过的第六套房子。

商楚尚发现，外婆对每套房子的回忆都是“忆苦思甜”式的，而且，无论多“苦”的阶段，她都能讲出几分“糖分”来。这反而成了商楚尚写作的一个“难点”：

“外婆很有意思，她讲故事的时候，完全不会提到任何人的不好。我写完之后发现，怎么你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好人，都在帮你？那也太无趣了吧。外婆说就是这样的啊，这时候妈妈就会跳出来，说那时谁谁不是对你不好吗？外婆这才愿意说得更具体一些，等于是被我“挖”出来一些负面的东西。外婆自己是不会主动提的，她一直是非常善良、朴素的视角。”

商楚尚还试图去“挖”外婆深层的情绪：你为什么对你的姐妹那么好？你为什么愿意放弃舒适的退休生活来上海？你想过要去做自己的事情、过自己的生活吗？但每次，外婆总是显得非常诧异：“不为什么呀，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呀。”

“00后”的商楚尚清晰地觉察到“应该”二字对外婆以及外婆那代人的影响有多深。外婆在五姐妹中排行第三，勤劳、谦让是“应该”；外公的养父母对外婆并不好，但作为儿媳妇，克制、守礼是“应该”；女儿要在上海安家，照顾、帮衬是“应该”；先

后带大了外孙女和外孙，说“我现在靠女儿享福，我很骄傲”，也是“应该”。

在商楚尚眼中，这些“应该”，很多都称得上是“奉献”，甚至“牺牲”，却都被外婆云淡风轻一带而过。商楚尚说，通过采访外婆、并将外婆的人生故事写成一本书的过程，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外婆那代人的奉献精神从何而来：“我终于认识了外婆，那个曾经熟悉的陌生人，我也终于看到了一个时代。”

“向内看”“往回看”的意义

在写作《外婆和她的房子》过程中，商楚尚确实发现外婆的记忆在衰退，十年前的讲述和十年后会不对号；但另一方面，她又意外地发现，外婆对很多数字的记忆是如此清晰：

7月23日到8月13日，是农活最繁忙的日子，早上4点就得起床，一直干到晚上一点半才能睡觉；

连续挑了13天水河泥，受伤的脚疼痛难耐，在镇上住了8天院；

1971年9月1日，（外婆的）妈妈胃病再次发作；

（1975年）结婚时，给阿四买了一条23元的毛涤裤子，和一件35元的中山装，那年夏天买的蓆子花了3.6元，这床蓆子用了整整25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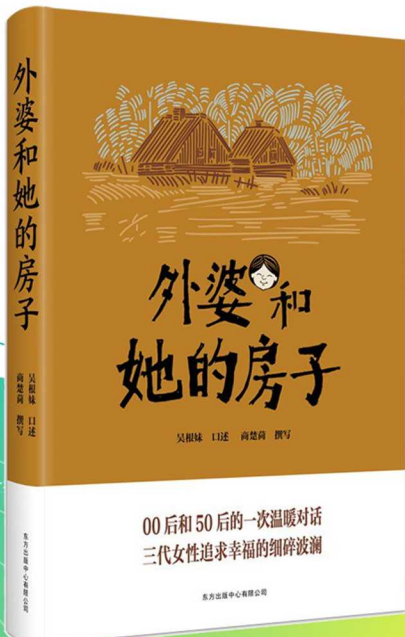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时候他们没有手机，也不用记事本，但就是对于这些生活中的数字有非常强大的概念。不仅是外婆，我外公的记忆也很好，外婆老家的姐妹们也记得很多事情。很多外婆记不清的细节，他们都做了补充。反而是到了我们这代，科技搞得我们不会努力去记住这些事情了。”商楚尚说。

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，有对个性、自我的主张和宽容，也有日益浓厚的焦虑、浮躁情绪。沈奕斐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到：“作为一个社会学者，我经常面对躺平、内卷、压力、焦虑等词汇，但每次和母亲在一起就会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量，只要听她讲讲她的人生故事，我就会觉得人生特别有希望，尤其在今天这么美好的时代，还有什么可以为自己不努力的借口呢？”

《外婆和她的房子》则将这样的“治愈力量”，传递给了更多读者。“我们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家、爱国，但爱的前提必须是了解。只有真正了解了我们家的历史，国的历史，才会产生真挚的感情。我希望女儿不仅去了解我的妈妈，还了解以前和现在的中国，了解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。”

即便离开社会学研究，在沈奕斐看来，追今抚昔，让一代人去了解上一代人、上上一代人，不仅有助于整个民族家文化的传承，也是时代和个人发展的必经之路。

“00后”这一代，他们更习惯往外看，往前看，他们希望到更外面的世界去探索，对未来更有向往。可是，我很高兴地发现，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向内看，往回看了，愿意去了解中国的发展，了解身边人的过去，努力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过去、现在和明天。这种向内看、往回看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”



本版图片/受访者提供
制图/张继